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宋代文学卷

读书众壑归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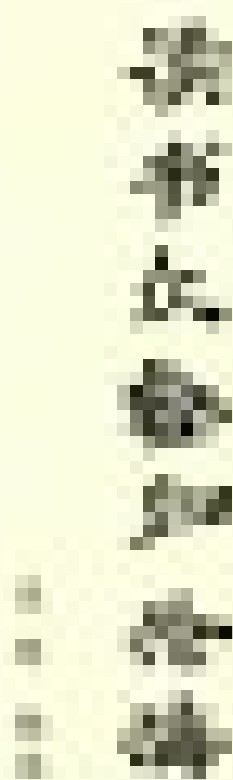
朱刚
编选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00 YEA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100 YEA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復旦中文學科建設叢書

宋代文學卷

读书众壑归沧海

朱剛
編選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众壑归沧海/朱刚编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宋代文学卷)

ISBN 978-7-100-15473-4

I. ①读…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宋代-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94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读书众壑归沧海

复旦中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宋代文学卷

朱 刚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73 - 4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9.5

定价:80.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断 代 总 论

“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	王水照	003
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王水照	017

分 体 研 究

《宋诗话辑佚》序	郭绍虞	037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	王水照	042
词艺杂谭	顾易生	057
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	王水照	068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聂安福	093
北宋贤良进卷考论	朱 刚	109
南宋洪适四六文论略	侯体健	126
南宋说话人四家	赵景深	134
《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	丁锡根	142
宋话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考论	朱 刚	158

作家研究

梅尧臣诗的特点	朱东润	185
欧阳修著述考	陈尚君	198
豪杰之文论		
——苏洵文学理论批评初探	顾易生	224
《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		
——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	章培恒	236
王安石著述考	高克勤	301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王水照	318
簞瓢吾何忧,作诗热中肠		
——论苏辙晚年诗	朱 刚	335
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	朱东润	355
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		
——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	王水照	374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	顾易生	388
陆游的创作道路	朱东润	401
稼轩其人其词	聂安福	420
刘克庄的文化性格与其文学精神的塑造	侯体健	448
编后记		465

断代总论

“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

王水照

一、宋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成熟期的型范

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也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进行创作，必然接受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坛风气的深刻影响。在制约和影响文学发展的多种因素和条件中，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成果的文化，无疑是关系最直接、层次最深的因素。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或许是一个较佳的切入口。

在唐宋文化研究中，有所谓“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的说法。据我们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傅乐成教授可能是此说的首倡者。他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①，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的“最大的不同点”。他说：“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

^① 见《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4期。

成见,也日益加深。”这里提出的从类型上来探究唐宋文化各自特质的命题,甚为精警(尽管在内容的界定上不无可商之处),因而获得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纷纷回应。

在我们看来,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形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当今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说: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邓先生这一“空前绝后”的最高级评赞,曾在学术界引起过讨论,但邓先生此说并非无因,实恐秉承师说。我们不妨看看他的两位师辈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见解:

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前之汉唐”“所不逮”、“造极于赵宋”即是“空前”,“后之元明”云云也就近乎“绝后”,而邓先生认为宋朝文明还超迈清代,更是转进一层了。如果再往上追溯,则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言:

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

——《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

这几位古今学术大师对宋代文化的一致评价,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一个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的新的质变点。对于“空前绝后”这样不免带有绝对化色彩的赞语,我们后辈学人或许可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和补充,但也很难达到他们的直觉表达所蕴含的对表述对象的深层把握,然则宋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成熟型的范式,应是没有疑义的。

对“宋型文化”的研究,困难之处不在于一般地确定其作为成熟型的特质,而在于揭示其区别于“唐型文化”的具体特点。在傅乐成教授用“复杂而进取”和“单纯与收敛”来分指两者各自特点以后,不少学者进一步予以发挥,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但某些看法,如认为宋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单纯性”等,似尚可继续探讨。^①

二、“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

早在1910年,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对“近世”的含义,内藤氏多从政治体制上着眼,他说:“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②嗣后,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则从社会经济、城市、教育普及等方面进一步论证宋代“近世”说:“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③几乎在同时,严复也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

^① 如罗联添云:“唐代士人勇于进取,宋代士人能收敛形迹,淡泊自甘”,“宋代文化是属于收敛的一型。”(《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差异》,《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0年版)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编第七章,说唐型文化“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宋型文化“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

^{②③} 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①他虽未用“近世”之名，但已敏锐地发现宋代与“今日”（清末民初）在社会文化形态上的种种联结点，指明研究宋代文化的现代意义，则最具慧眼。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就把“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称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而胡适则径称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为“现代阶段”或“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或“中国的‘革新世纪’”^②，论断更为鲜明。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流行看法，大抵从两个方面来确定“近代化”的含义，一是从社会制度的性质来界说，即封建制的解体、农耕自然经济结构的崩坏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一是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立论，即以所谓“西学东渐”、接受西洋文化为标志。然而宋代均未达到这样的历史阶段。一般说来，中国封建制的动摇或逐渐解体，是明中叶以后才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宋代城市发展、手工业、商业繁荣，虽对上层建筑带来某些深刻而有意义的变化，但毕竟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宋代的政治权力结构、主要的社会思潮和文人基本的文化心理等尚无明显的重大影响，“西学东渐”更未提到历史日程。那么，怎样来理解上述诸家之说呢？我们不妨从宋代的“祖宗家法”即治国纲纪、安邦法度入手，具体考察一下其政治结构、社会思潮、文化心理等特点，看看是否包含一些指向“近代”的新因素。

众所周知，有宋一代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皇权得到空前的提高。然而，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又是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有两个数字很值得注意。一是科举取士。据统计，北宋一代开

① 严复《致熊纯如函》，《学衡杂志》第13期。

② 《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科 69 次,共取正奏名进士 19281 人,诸科 16331 人,合计 35612 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 61000 人,平均每年约为 360 人。^①这不仅比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差悬殊,而且也为元明清所不及的,真可谓“空前绝后”。宋代又增设封弥、糊名、誊录等制度,尽可能地实现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提高了封建政权的开放性。尤可注意的是大批“孤寒”之士进入官吏行列。宋太祖曾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②唐太宗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也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话^③,此乃反映出科举制开始取代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这一历史进步的喜悦,而实际上唐代的取士权并未完全从“势家”大族手中收回,就政权的开放程度而言,不及宋代。二是布衣入仕的人数比例。据统计,从《宋史》有传的 1953 人的材料中,两宋以布衣入仕者占 55.12%,比例甚高。^④另从最高的宰辅大臣的成分来看,唐代虽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作了很大的冲击,但世族仍保持相当的政治势力,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 23 人任相,占全部唐代宰相 369 人的 1/15。而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者外,非名公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均出于寒素或低级品官之家,并形成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

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引进了多种平衡机制。首先是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涉的建制,对相权予以限制和分割,皇权从制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例如在一般情况下,重要官员的任命权统归皇帝,“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圣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⑤。然而,宋代的政治发展史表明,“祖宗家法”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实现,皇帝在多种场合下不得不听命于掌握实际权力的宰执大臣的意志,这在

① 参看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 2 卷。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二月条。

③ 《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④ 参看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卷 9,1972 年第 4 号。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〇,元祐元年闰二月条。

三百年间的朝廷舞台上可以找到明确的例证。^①其次是台谏对相权的抑阻。北宋之前，谏院并非独立职司，谏官原是宰相衙门的属官，其监督的对象是皇帝；宋仁宗时，谏院成为独立机关，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监督的对象转以宰执、百官为主，职权范围大大扩大；同时又有谏官“风闻言事”的特许，鼓励“异论相搅”，这也成为专制政权中一种有力的自我牵制，助长了政治上自由议论的风气。苏轼对此领悟尤深。他在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中把此作为“朝廷纪纲”。他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又说：“陛下（宋神宗）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苏轼此论深中宋朝政制的一大关捩，故常为后人引以为据，如南宋楼钥在《缴林大中辞免权吏部侍郎除直宝文阁与郡》中（《攻媿集》卷二七）为曾任言官的林大中辩护，即引苏轼此大段言论，说明这一制度一直施行到南宋。

宋代上层政治中的党争，尤其是围绕庆历、熙宁变法而展开的新旧两党之争，也具有近代政党的萌芽。绵延近40年的唐代牛李党争，恩怨源自私门，是非出于意气，说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的实质性分歧，因而只能成为瓦解封建政治秩序的破坏性因素。北宋前期的党争双方，其主要领袖人物大都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忠实信徒，只为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的实现，而互不相让、争斗不止。吕夷简为宰相时，范仲淹进《百官图》以弹劾吕氏，指斥他升黜官吏之不当；但后来吕氏竟为范氏出谋献计；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过郑州时，退居的吕氏提醒他说：“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若欲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为便。”一语竟使范氏“愕然”；果然，在朝的范氏政敌趁他赴边之际加紧攻击，促使“帝心不能无疑矣！”^②

^① 参看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庆历党议”。

后来“夷简再入朝，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①苏轼与王安石熙宁时互为政敌，形同水火，及至元丰末，两人在金陵诗歌唱酬，对彼此之道德文章互致仰慕，苏轼甚至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②。即使对同一政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也表现出不计私憾的真正政治家的风范。如王安石与吕惠卿。先是欧阳修把吕惠卿推荐给王安石，后王氏倚为变法的主要助手。吕氏继则阴挤王氏，矛盾激化。但事后王安石在《答吕吉甫书》中说：“与公（吕惠卿）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宋人信奉的“立朝大节”，昌公论而杜私情，公私犁然分明，不容许个人恩怨掺糅其中，把政治行为上升为一种伦理美学，这在早期党争中颇为突出。总之，士大夫们为某种政治主张而组党相争，并从理论上公然亮明“君子有党”的正当和必要，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具有某种开创性，同时作为政治制衡的一种机制，也有启迪未来的意义。

赵宋王朝权力结构的多种制衡机制，互相维系，彼此制约，其出发点原是为了加强皇权，治国安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因而勉强赢得了“百三十余年，海内晏然”的表面安定。^③然而，这种制衡机制同时又在士大夫中间催生出限制君权思想的萌芽。尤其是宋代士人身受强敌压境、辖地始终未能恢复“汉唐故地”的偏仄情势，看惯了唐末五代军阀篡权不断、犹如儿戏的这部“近代史”，“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无情地揭穿了“真命天子”的神话，加上两宋十八位君主以平庸无能者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他们在原始儒学“民为邦本”的命题基础上，不断地滋长起限制君权的思想。范仲淹说：“冠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④“忠”的标准已不是对一家一姓的“愚忠”了。李靓虽然严

① 《宋史》卷三四《范仲淹传》。

② 《次荆公韵四绝》其三，《苏轼诗集》卷二四，中华书局版。

③ 范祖禹《转对条上四事状》，《范太史集》卷二二。

④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五引。